

暨南大学在建阳

周谷城题



中共建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暨南大学在建阳

致

读

者

这本书记录 20 世纪 40 年代,国立暨南大学从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到“五二〇反内战”学生运动的全过程。我们是学生运动的参加者,本书的撰述者,现在是赠书者。我们赠书的目的,是为研究这个历史时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留一份真实可信的资料。因为是私人付款,书赠图书馆供广大读者借阅。

中共福建省建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暨南大学一群年过古稀的建阳校友

张 连	洪 惠	王 准	陈秀民	钱国屏	范家震
陈向新	苏寿桐	杨耀宗	许甫如	宋鼎臣	王 驾
金家麟	何家沛	史震彝	沈 涌	戴 钢	林楚平
郑晶莹	陈清岛	林祖岳	周成哲	陈 璧	钱章录
傅春龄	王炳森	魏 琦	周承训	冯 坚	陈 镛
沈定一	魏 忠	王世杰	陈 方	颜章飘等	同赠

1998·12·30

中共建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目 录

序 中共建阳县委 (1)

闽西南白区党在暨大建阳时期的

组织和活动 张 述 (1)

我在建阳暨大时和地下党的联系 吴大观 (6)

在建阳暨大的两年(1941—1943) 金家麟 (8)

暨南大学在建阳时期学生运动大事记..... 王 准等 (18)

诗两首..... 许 杰 (26)

从建阳到上海..... 钱国屏 (28)

事实和看法..... 林楚平 陈忠斌等 (94)

为民主呼喊的“太白文艺社” 许甫如 (112)

我所知道的暨大学林社 蓝尤青 (118)

学会作熔炉 马列育新人

——回忆暨大史地学会 王 驾 (121)

建阳时期的暨大“中国文学研究会” 傅春龄 (132)

记许杰教授 陈达煊 (136)

忆暨南大学经济学会 钱彰祿等 (140)

暨大女同学会活动记 陈 璧 (144)

血染韩江 气贯长虹

——记柯以圻烈士伟大、无私而短暂的一生

- 郑晶莹 (149)
- 林维雁烈士传略 叶味真 (165)
- 记王多祥烈士 傅春龄 (175)
- 缅怀为新中国诞生而献身的人们
- 康光华 郁锡明 王厚仁 (178)
- 方光焘教授 方文惠 (182)
- 卓如教授在暨大 魏 琦 (188)
- 王亚南先生在建阳 胡士璋 (197)
- 追思何校长柏丞先生 沈鍊之 张 玄 王正平 (201)

致许杰老师信

- 话当年学习生活 王瑞章 (208)
- 童游时代的愉快歌声 陈 默 (212)
- 建阳暨南剧社 蔡启鸿 (215)
- 暨大京剧团在建阳 李振宇 (218)
- 到上海后打响的第一枪
- 回忆暨大在上海“抗暴”斗争中 史震彝等 (221)
- 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
- 回忆“五·二〇”..... 戴文坡 (232)

- 关于“壁联”的两个资料 (239)
1. 发起组织壁报联合会缘起 (239)
2. 关于“壁联”
- “壁联”的代发刊词 柯以圻 (240)
- 《壁联通讯》第一期第一版上的两篇文章 (243)
1. 我们还要争取 巴 (243)

2.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

——记第一次座谈会 洛 (244)

《壁联通讯》第一期第二版的四篇文章 (247)

1. 顾问们的话 以白 (247)

2. 记壁联增刊前后 哲之 (248)

3. 在“壁联”联谊会上 杨羊 (250)

4. 壁报巡礼 阿宝 (252)

暨大学运与朱语今同志的有关回忆 (255)

《暨南大学在建阳》党史、学运史座谈会纪要

..... 中共建阳县委党史委 (258)

编后记 (261)

闽西南白区党在暨大 建阳时期的组织和活动

张 连

暨南大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学校，它的前身暨南学堂，创办于清光绪卅二年（1906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校，一九二七年扩展为大学。抗战前校址在上海真茹，抗战中校舍毁于日寇炮火，学校内迁福建建阳县。抗战胜利后，于一九四六年夏复员迁回上海。当时设有文、法、理、商四学院十四系和一个先修班，学生1500余人。

暨南大学也是一所富有爱国民主传统的学校，早在一九二三年七月恽代英就在暨南大学建立党支部，发展组织，进行革命活动。之后，党的活动赓续不断。抗日军兴，江西、福建成为战时东南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当时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是一位开明爱国的历史学者，他以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兼容并蓄精神为榜样，多方罗致名流担任讲席，不少马克思主义者、进步文化人、东南各地进步学生，纷纷转到暨大执教读书，学校抗日进步活动日趋活跃，是东南抗日进步的一所著名学府。

闽西南白区党是闽粤赣边区党委和闽南地委领导下的在白区工作的党组织。一九四一年“南委事件”后，闽粤赣边委决定将在闽南难以立足的党组织和党员，分别转移隐蔽，藉以保存和积蓄力量，一部分有文化的党员有的到学校教书，有的让他们继续升学。当时闽南各地有不少青年、侨生、侨属青年就读暨大，其中有不少

是党联系培养的对象,还有相当部分是曾在党领导下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作的集美等闽南学校的进步学生。党组织认为必须争取和做好这所既是国立大学又是华侨最高学府的学生工作,培养和造就革命所必需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一九四三年党决定派党员洪惠美(洪惠)考入暨大,一九四四年又决定派党员林绿竹(张连)也考入暨大,边读书边做党的工作。

由于“南委事件”及“皖南事变”,东南各地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党员从各地转移到建阳暨大。据后来了解,从各地来暨大教书的原我党党员教授有张立、卓如、吴大琨;进步教授有许杰、盛叙功、叶作舟、陈文彬、王亚南、沈鍊之、方光焘、管听实、陈守实、孙怀仁……等;党员或已与党有联系的进步学生有陈斐然、金家麟、沈根源(沈定一)、林楚萍、柯以圻、刘观祥、钱国屏、胡戎、诸仙仙……等,他们多数与原党组织失却联系,但他们都联系和团结了周围一些同学,用功读书,追求真理,起了很好作用,这给闽西南党在暨大开展工作提供良好条件和群众基础。

建阳位于闽北山区,建阳的太阳山是闽浙赣省委的主要根据地和干部培训所在地,闽西南地下党组织曾设法争取与他们取得联系,由于敌人对太阳山根据地的围剿封锁,我们始终没能找到当地党组织。建阳又是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重要据点,警备司令钱东亮是杀人成性的屠夫。暨大校内,以训导长韩通仙为头子,建立学校三青团分团部,发展了不少三青团员,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江苏省委的秘书长,是出卖省委、出卖同志的大叛徒,当时他还是建阳反动当局为“消灭黑党”而组织的“联席会议”的成员之一,纠集一批亲信和三青团骨干监视和破坏学生民主运动。地下党认为暨大有一定群众基础,革命力量正在活动中聚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丑恶表演,又从反面促使广大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大学生的觉醒,斗争形势的发展,对东南各省的政治影响将是很大的,必须十分重视,认真地组织引导。

抗日战争胜利前,党同国民党有联合,又有斗争。闽粤赣边委据当时形势和主客观条件,给暨南大学党组织的任务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这期间党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布置党周围的积极分子,广交朋友,了解情况,团结和培养学生中的进步同学,并在积极分子中组织和介绍学习进步书籍为:《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程》(即延安规定为干部读物的一本)、《政治学大纲》等,传播真理,提高觉悟;通过党联系的积极分子在各同学会、各同乡会进行活动,团结进步学生,并用举行学术讨论会、读书会、文艺活动等形式对同学进行教育;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参与组织“学林”、“太白”等文艺社团开展进步理论和文学艺术的学习和活动。

暨大在建阳期间,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曾发生了一些事件,我们党都审慎地进行政治分析和判断,根据当时主客观条件,采取相应措施对策。当时党处于地下状态,党的看法和做法,是同团结在党周围的进步同学,积极分子一道商量而共同决定的。

一九四四年底,蒋介石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企图建立十万现代化嫡系部队,以联合美军夺取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校内反动势力大肆宣传,鼓动学生报名从军,并籍此以扩大国民党影响,纠集力量;接着以训导长韩述仙会同中文系教授魏应麒为首的一伙人便以已报名但未入伍的青年军学生为基本力量,用诬蔑总务长盛叙功贪污为由,纠集一小撮人采取突然袭击手段,强行驱逐进步教授盛叙功(总务长)、许杰(教务长),企图削弱和打击进步力量,扼杀正在酝酿兴起中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事态发生突然,进步力量来不及组织反击。之后,党通过积极分子在同学中议论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启发同学认真思考认识反动势力的阴谋,逐步引导广大同学关心国家政治形势和时局趋向。

经过教育,党组织同时认真慎重地进行发展党员工作,一九四五年七月吸收王新整、何家沛二人入党。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国民党反动派四处出兵，以武力掠夺抗日胜利果实，内战危机乌云滚滚，反内战、要和平、要民主成为全国人民迫切的希望和要求。这时上级党组织给暨大闽西南地下党组织的任务是：开展民主运动，声援全国学运，发展党的组织，在学校中积极培养一批能坚持白区工作和能从事武装根据地建设的知识分子干部。一九四六年后，还要求组织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台湾开辟工作。

在全国形势急速变化时刻，暨大地下党组织要求周围的进步同学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组织传阅《新民主主义论》、《方生未死之间》以及《文萃》、《民主》、《周报》和党的刊物《群众》等进步书刊，提高思想认识，积极支持并参与筹备成立全校性进步组织“暨大学生壁报联合座谈会”，简称“壁联”。当一九四五年底发生的西南联大学生被杀的“一二·一”惨案消息传来，以“壁联”为进步力量团结的纽带，带动学校各社团，发动抗议罢课，发通电，声援西南联大同学，出版悼念专辑，召开追悼会，揭露国民党假和平，假民主，镇压群众的狰狞面目和谎言伎俩。这是一次尖锐的斗争，而斗争也检验并组织了进步队伍的力量。不久国民党政府制造的东北张莘夫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苏活动，当时校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蠢蠢欲动，妄图借以打击进步力量。“壁联”主动召开全校性的东北时局座谈会，揭露事件的真相，使其策划学生参加的反苏游行阴谋破产。建阳当局组织的反苏游行，暨大学生一致抵制拒绝参加，这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地区是很突出的。

一九四六年一月，先前为首参与制造事端驱逐盛叙功、许杰两进步教授的中文系教授魏应麒在一堂文学课中解释“伧父”一词，丑化苏北人，引起苏北籍同学的不满。嗣后，魏应麒不仅不检讨自己的失误，反而在第二次上课时纠集一伙人在教室后座助威制造声势。课后，江淮同学会公开表示抗议，同学们纷纷起来响应。“壁联”及各社团积极支持江淮同学会向校方提出的解聘魏应麒和开

除一个姓魏的主要追随者的学生的正义要求，地下党支持这一正义行动，最后迫使这两人离校。

校内外反动势力不甘失败，准备用武力镇压暨大进步力量，学生组织“护校委员会”集体自卫，坚持斗争，保卫学校安全。在此基础上，通过全校同学民主选举，改选原有反动势力控制的学生自治会，成立以进步同学金尧如为主席的学生自治会。

四月，学校决定复员，迁回上海，提前放暑假，学生全部回家。党组织委托党员柯以圻和所联系的群众，学生自治会主席金尧如，理事戴文坡、陈璧及“大白社”活动分子周继文等人随校先到上海，要求柯以圻到上海后积极设法与上海党取得联系。以后他是完成了这一份任务的。

在暨大读书的闽西南地下党员和党所联系的许多进步同学回到闽南后，同年三月间闽南特委副特派员罗琳来泉州传达上级党员指示发展党员，先后批准李法儒、陈泗东、方勤、叶友德、戴棋竺等人入党，以后又陆续先后批准黄茂德、卜新贤、金尧如、周继文、林楚平、林大厦、郑英杰、谢金庭、林祖岳、陈启贤（陈方）、王朝旦（王准）、黄选卿、刘春生、颜章禀等人入党（以上均暨大学生）。四月筹建厦门市委，由陈华任书记。八月间，罗琳、陈华、张连、李法儒、陈泗东等在厦门召开党的会议，传达党“七大”会议精神，举行新党员入党训练，布置发展党的组织；对暨大已毕业离校的党员和联系的进步同学作了工作安排，研究开展台湾工作，决定建立台湾工作委员会，抽调梁新民、林吾地（庄牧）配合李法儒往台湾开展工作，安排王新整、何家沛、陈华等党员在同安中学任教，以开展白区工作，研究回上海继续读书同志的工作，决定成立上海暨大党支部，张连任书记，洪惠任组织委员，陈泗东任宣传委员。此后闽西南白区党在暨大复员回上海后，继续开展工作，又在闽南、台湾等地区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我在建阳暨大时和地下党的联系

吴大琨

从一九四二年的十二月起到一九四四年的二月份止，我在福建建阳的暨南大学工作过。当时我是暨南大学文学院的讲师，教英语。后来又在暨南大学的商学院兼教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当时，我的处境是很特殊的，因为我是刚从建阳徐市镇的“上饶集中营”（因日寇进犯，“集中营”从上饶迁到徐市）里被保释出狱的“政治思想犯”，实际上，仍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军警特务们的监视。但我一直受到当时在建阳的中共地下党的爱护与支持，在生活上受到党的很多照顾，这使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很感激的。

事情要从江西的上饶说起。因为我是由于去新四军慰劳而被国民党反动派于一九三九年五月拘禁在江西上饶的。我在上饶的狱中时，当时在上饶《前线日报》社工作的中共党员殷梦萍同志就曾派人来探视过我。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在上饶的《前线日报》社内，由于有宦乡同志的掩护，是存在着中共的地下党组织的。一九四二年春季，浙赣战事发生后，“上饶集中营”从上饶迁至福建建阳的徐市镇，《前线日报》社亦同时迁去建阳。当时《前线日报》社内的同志曾在我出狱后给了我种种生活上的帮助（如帮助我把家从崇安迁移到建阳，并在建阳借给我住房等）。与此同时，暨南大学内部的学生，其中有的是党员，也开始和我接近。但由于我当时的特殊处境，这些进步学生来接近我时，行动是非常小心的。他们的姓名我现在已都记不起来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在宿舍的书桌上忽然发现了一张照片，这是牺牲在徐市镇“集中营”

里的王闻识烈士的坟墓照片。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想起王闻识烈士生前在“集中营”和我们同囚一室,最后竟被反动派迫害致死的种种情况,心里很伤感,也很激动。我想在当时的情况下,王闻识同志并没有亲属在建阳,除了地下党的同志会冒险出来料理他的葬事外,是不会有其他的人会站出来干这件事的。他们为王闻识同志安葬以后,又把坟墓照相送给我留念,他们究竟是谁?但是,就在那天傍晚,我出外散步时,在路上遇见一位暨大的同学,他似乎象是在路口专门等我的样子,他问我:“吴先生,照片收到了吧!”我答:“收到了”。然后他就向我一笑,很快地走开了。我自然一点也不知道他的姓名。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在建阳暨大的两年(1941—1943)

金 家 麟

一、 陈斐然和我同进建阳暨大时的政治情况

1941年深秋初冬,陈斐然和我两人一道考入了当时迁建在福建建阳建溪岸边的暨南大学。陈斐然读文学院中文系,我读文学院史地系。入学时已经是十二月了。校舍是由建阳文庙改建的。开学立即是严冬。记得早晚在简陋透风的教室里自修,砚台上的墨水都结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正是“皖南事变”后的一年,一方面是日寇进占上海租界,在东南猖狂展开扫荡。另一方面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在后方制造白色恐怖局面。我们到建阳后不久,就看到国民党的建阳警备区司令钱东亮正在“围剿”闽北根据地。他叫嚣他的一把刀已经杀了九百多个人头,非要达到1000个不可。建溪南岸滩头,三天两日都在杀人,烈士鲜血染红了建溪的江水。而青年学生中,当时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坚持抗战、要求民主的运动也正在形成和发展。

陈斐然和我都是温州人,我们当时都是失去了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我是1938年秋在温州入党的,曾任温州(当时称永嘉县)城区区委青年委员,县委学运会书记,温州中学党支部书记,是1940年秋温州党员干部大调动中,因病未曾下乡而失去组织联系的。斐然原是浙南党内的区委书记,后来去新四军教导队,在1941年春“皖南事变”中脱险回到温州,也失去了组织联系。我们为避免

温州国民党特务的搜捕,同时也为找出路,于1941年秋,同几位已经去福建医学院读书的同志,带我们去福建准备考大学读书。我们首先在福建医学院借读旁听,后来暨大在福建招生,就考进了暨大。在暨大的两年中,我们没有在校内发现地下党组织。虽然失去党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本着自己的政治觉悟,依靠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导,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主要的做法是:顺应同学们的爱好,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开展文艺和学术活动,从而把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化为形象的语言,群众的呼声,并联络、团聚一些志同道合的,以及不满现实、倾向进步的同学和老师。于是,逐渐形成一支活跃的进步力量,把沉寂的学府搞得生气勃勃。正义的事业是磨灭不了的。我们的工作尽管刚刚起步便遭到挫折,然而,在建阳的暨大从此再不沉寂了。

二、在暨大的同学关系和教授关系

初到暨大后,我们除了和温州回乡同学在一起外,因寝室的接近,首先接触了福建莆田的同学。在莆田同学中,我们首先发现了欧文泉。他是一位家庭出身贫寒而认真求学的人,待人十分热情诚恳。我们知道他在政治上还在启蒙状况,但有强烈的正义感,爱憎十分分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强烈不满,积极倾向进步。我们很快就订交了。通过欧文泉又结识了莆田同学郭养洛、卓承赐。他们两位正热情地倾向进步。郭养洛后来成为我大学四年中最亲密的同学之一。我们共同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接着又接近了闽南和江西的同学。在闽南同学中又发现了肖俊英。他也是一位待人热情真实而又愿意接受新事物的人。通过我们的接触,他很快接受进步思想,后来也成为我大学四年中最亲密的同学。他当时是暨太闽南同学会的会员。通过他,我们与闽南同学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这样,

在上海同学内迁之前，陈斐然、我、欧文泉、郭养洛、肖俊英我们五人建立紧密的联系，我们在一道经常谈论一些学习进步社会科学的心得，谈论文艺，谈论时局政治，相互间有很好的交流。五人还经常在一道，分析同学情况，一道去拜访、求教我们发现的进步教授。

1942年春，上海暨大同学迁来建阳了。我们密切注意上海同学的情况。不久我在史地系就认识了沈根源、杨春燊、柳泽萃、周光岐等同学，发现他们也非常愿意接近我们。我们当时看到沈根源同学在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知道他有明确的进步倾向，在上海内迁同学中很有威信，后来他被选为全校学生会主席。当时我与陈斐然一道猜测，他可能是有党的组织关系的（直至现在，我才听根源同志自己说，他当时在上海与党内同志有联系，参加了党领导的进步活动，但当时他尚未入党。现在又知道，当时的柳泽萃同学，则是同我们一样，是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我们积极地和他联系。陈斐然在中文系又同欧文泉一道认识了上海内迁同学中的祝丰和桑雅忠。祝丰当时文才横溢，看来对进步事物也很熟悉。桑雅忠的散文写得很好（现在知道，他在抗战初期也曾在浙江宁波入党，当时则早已失去组织联系）。这样我们和祝、桑也接近了。通过沈根源、祝丰、桑雅忠，我们已认识了杨选堂。他当时在上海内迁同学中很有名声，是读商学院的；同学中传说他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很有基础，受到当时暨大教务长、商学院院长、国内知名教授周宪文的器重和表扬。但是，他当时又是上海内迁同学中的三青团负责人，在校内也积极从事三青团活动。因此，陈斐然和我对他还有戒心的。但据沈根源说，他还是能接近的。沈和他两人当时都是上海内迁同学中的头面人物。以上几位同学就是我们在暨大初期除温州同学（木沛楠、诸仙仙、纪渊、应振昌、黄秉芳、余子来）外最初会聚起来一群。另一方面，当时同学中的三青团员是很多的，闽南、福州的同学很多都是在高中集体入团的，江西同学中三青团员也很多。当时他们在学校的活动不少，例如办暑期集训团等。从总体上说，三青

团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学生中的代表力量,但是,有不少同学,他们虽然在高中时集体入了三青团,而他们的认识却在发展,因而也有不少三青团员在思想上都转向进步,如肖俊英就是其中之一。那时我们也知道要努力争取团结这样的同学。由于我们接触面有限,同学中还有一些有进步关系和进步思想的同学,只是我们还未曾发现、还没有与他们建立联系。

教授中最初来建阳建立内地暨大的,是周宪文、吴修、许杰三位。周宪文是初建内地暨大分校的负责人,是当时国内知名教授。他研究西方经济学,我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但是,听说他是国民党特别党员,因此也就不敢接近他了。吴修教授是我们第一学年时的训导长,管生活纪律管得很严,我们当然是避而远之的。只有许杰教授,他是当时内地暨大中态度最明确的进步教授,所以我们最接近他。我们以后在暨大搞未明文艺社,主要就是由于许老师的支持和启导。后来,在史地系我们听盛叙功教授的课,发现他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讲授地理学的,沈根源同志和他很接近,我也崇敬他。后来的史地学会的活动,就是在盛老师的支持下进行。再就是方光焘教授,他是一位正直、十分诚实的知名教授,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怀有十分强烈的不满,热烈同情和支持青年学生的进步民主活动,我们后来的活动也得到他十分明确而深沉的支持。这时教我们论理学(即逻辑学)课的是韩通仙教授,他在课内也讲历史唯物论。在讲解出错的时候,我还曾在课堂上和他辩论过,通过这次辩论即发现他倒容易接近,我们到他家里拜访,他总是十分热情地招待,但总觉得不了解他的底细。第二学年后,他居然出任学校训导长,后来又知道他是福建省三青团的头子,与当时福建省省长陈仪关系密切,在福建省国民党中有重要地位。当时我们也猜到他有复杂的历史,但是,他出任训导长后,当时反动表现尚不露骨,而且仍然与我们保持原来那种接近关系。我们知道他有笼络、利用我们之意,但反过来,我们也有利用他这一重要关系的必要。所以,

我们和沈根源商量,取得一致看法的。这样我们就与他保持着这种两方面的关系,这对我们后来的活动是有利的。

此外,学校又聘来了卓如教授和陈守实教授,两位都是明确支持学生的进步民主运动的,后来的史地学会和未明文艺社的活动都得到他们的支持。孙怀仁教授当时也在暨大,他后来出任东南联大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我们知道他内心也埋藏着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强烈不满,但当时他是不问政治的。吴兆莘教授后来也来暨大。他是中国财政史专家,后来他出任东南联大和英士大学的经济系主任。他自己有革命的历史,在暨大和英大,他也都默默地尽他可能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吴大琨教授大约是1942年冬来校的,当时他刚从上饶集中营出来,我转入东南联大后曾多次去看他,知道他仍然坚持进步思想和支持学生进步活动。

三、未明文艺社和史地学会

1942年春,陈斐然和祝丰以他们的写作受到许杰老师的表扬,就是在许杰老师的这种鼓励下,陈斐然和我以及欧文泉商量,联系祝丰、桑雅忠(他俩联系一批上海来的同学,并主编墙报《文艺沙龙》),在暨大发起组织未明文艺社。当时的建立,主要是许杰老师的支持,但方光焘老师也是热情支持的。为了通过它团结更多同学,它完全采取公开组织的形式,通过韩遁仙的关系,在学校训导处办理正式登记手续。成立时选祝丰为社长,陈斐然为副社长,桑雅忠为文艺部长,我为学术部长。祝、桑因为是上海内迁同学,他们和沈根源、杨选堂都是很接近的,成立时,他们找沈商量过,所以,未明文艺社的成立,也是得到沈根源的支持。后来他和柳泽萃也都参加了未明文艺社。杨选堂也喜欢写诗,而且他在内迁同学中有名声,所以,沈根源和祝丰、桑雅忠也把选堂拉来参加。这样,未明文艺社从成立之初就以祝丰、陈斐然、欧文泉、桑雅忠、沈根源、柳泽